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确立之谜
中国共产党核心政策决定之谜

王明：一个二十多岁的书生，为什么享有那么大的权力？
周恩来为什么能够多年一直居于领导核心阶层？
毛泽东是否考虑过邓小平作为接班人？
无德无才的胡锦涛，为什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来是确定党的路线方针和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关键场所。

动

态

分

析



2 022 6304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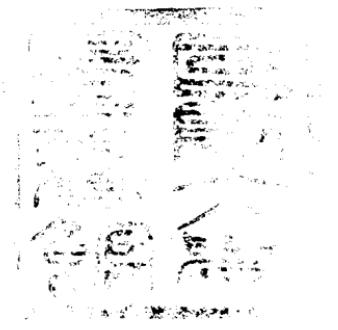
中国向何处去 丛书

674936
19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
代表大会动态分析

张希贤 王宪明 编 著
张伟良 陈广侠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太原

晋新登字 6 号

中国向何处去

张希贤 王宪明 编著
张伟良 陈广侠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光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203—02514—4

D·513 定价:6.00 元

前　言

社会主义有无发展前途？

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时代提出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随着事变的发展，这两个问题也越来越尖锐。

那些希望社会主义发展，关注社会主义命运的善良的人们，迫切希望此两个问题有一个良好的答案。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不少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台阶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有不少人为中国向何处去而发生忧虑。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基本问题。但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的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和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某些原理相去甚远的三个基本问题，又迫使人们仍在苦苦地思索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为着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为着获得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做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来窥探一下中国的发展未来，来总结一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得失，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发展方向。

本书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写起，重点分析 70 余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来龙去脉。书中所论，系

我们自己一家之言，旨在思想战线的思辩中抛砖引玉。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颇和错误之处，因此，恳请对中国命运十分关注的同人和有兴趣参加关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讨论的同志提出自己的独道见解和指正我们的不足。

中国，在一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显露出蓬勃的生机。事业是伟大的，同时也是艰辛的，无论从哪方面说，我辈都应当努力！

1993年1月15日写于中央党校

目 录

第一篇：历尽艰辛的探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最初 14 年)

-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大) (1)
- 二、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纲领(二大) (13)
- 三、适应新形势、制定新策略(三大) (22)
- 四、革命领导权问题(四大) (30)
- 五、革命面临危机与软弱无力的中共五大 (38)
- 六、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对党的领导人的艰难选择(六大
前后) (45)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质的飞跃

(逐步走向胜利的 14 年)

- 七、领袖集团的逐步形成(从遵义会议到七大) (63)
-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72)
- 九、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77)
- 十、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逐渐完善 (85)
- 十一、勇于迎接和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 (90)

第三篇：百折不挠的追求

(27 年的曲折历程)

- 十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七届二中全会
到八大) (94)
- 十三、血泪交织的悲壮的追求(九大、十大) (129)

- 十四、建国后前 27 年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大变故与
调整 (156)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质的飞跃

(探索新道路的 14 年)

- 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
十五、必然的趋势 (194)
十六、伟大的历史转折 (202)
十七、第二次飞跃的几个标志 (210)
十八、严峻的考验与新的突破——十四大前夜 (245)
十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61)

附：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篇 历尽艰辛的探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 中国革命实际的最初 14 年)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21年7月，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导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光辉标志和开端。

1、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新的力量，找到了解放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拯救自己的祖国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在这80年里，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特别是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将

永远为后人称颂。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武器、太平天国的救国方案，在强大敌人面前败下阵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武器、君主立宪制的救国方案，被封建顽固派一反击，也宣告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幻想依靠欧美“友邦”的支持，把中国引上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富强之路，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感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变学习的方向。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逐步传入了中国，使中国人民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新的曙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六三”以后，以上海工人阶级为先导的许多城市的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或示威游行，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局面，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封建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义的建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产业工人达到60万左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于是，中国工人阶级也随之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二百万人，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们一起编辑《新青年》。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称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李大钊等人的带领下，一些探寻中国社会改造及出路的爱国青年，开始转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社团增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主要有：李大钊在北京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组织的“利群书社”；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组织的“大励新学会”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合办的《每周评论》；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办的《觉悟》；恽代英在湖北创办的《励新》；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阮肃仙在广东创办的《新学生社》；彭湃创办的《赤心周刊》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时全国各地创办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到四百多种。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队伍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成份构成，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逐渐深入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和论战。首先是，李大钊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进行了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次是陈独秀、李达等同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的“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再次是，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李大钊等人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初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明辩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真伪。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需要革命的物质力量。“五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2.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准备

“五四”运动后的斗争和实践，使先进分子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1920年初，“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了建党的探讨和酝酿。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并探讨中国是否能建立共产党。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与陈独秀会晤，他们研究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发起组，并与李大钊相约，分别与南方和北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当地建立党的组织。

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施存

统、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等人在法国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各地党组织建立以后，开展了各方面的革命活动，为创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好准备工作：

第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起，作为自己公开的机关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情况。同年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自己半公开的机关刊物。这个刊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刊物之一，它一共出版了六期。刊登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其中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节选）、《俄罗斯的新问题》等。另外还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特别是1921年4月7日刊登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标志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形态传入中国并开始付诸实践。《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是由列宁负责起草的，1921年4月传入中国之后，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生了重大影响。它帮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解决了在建党的思想条件和阶级基础基本具备了的情况下，寻找以什么方式和手段建党？按着什么组织原则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重大问题。

第二，出版工人通俗刊物，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1920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11月，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出版《机器工人》；12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出版《友世画报》；接着，又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和小沙渡劳工半日学校等。1920年11月，在广东创办了《劳动者》；1921年2月，创办

了《劳动妇女》周刊；1920年底至1921年4月，在广州先后成立了31个工会组织，同时，开办了广东机器工人夜校。1920年11月，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1921元旦，开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5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7月，出版了《工人周刊》。在山东济南津浦机车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出版了《济南劳动》。在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地也都相继组织了工会，工人识字班和夜校等。通过上述活动，把马克思主义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传播到了工人群众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三、对于建党原则的探讨。1920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通过《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革命党，实行暴力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对此，国内外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及其他先进分子，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最终目的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其中以蔡和森与毛泽东的讨论，最为突出。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月给毛泽东的通信中，阐明了他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符合列宁建党原则的正确见解。蔡和森提出，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只有这样，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为达到此目的，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毛泽东再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称赞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各地党组织的筹建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条件已

经成熟。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诞生。

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3月，派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来中国帮助建党。6月，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经过了解之后，认为中国建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和党内酝酿讨论的结果，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之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东京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上海发起组的倡议，很快选出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望志路一〇六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7个地区共12人，其中：上海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有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有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有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有陈公博；日本东京代表有周佛海。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于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未准；李大

钊因北大校务繁忙，都没有出席大会。包惠僧受陈独秀的委托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大会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他首先向各位代表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并提出了准备讨论的几个问题。马林、尼柯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词。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接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尼柯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和任务，建议中国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

然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认为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和制定党的纲领，提出今后实际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大会根据会议制定的议程和任务，选举了党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经过两天的时间，起草小组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代表们用了三天的时间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讨论认真而热烈，各地代表各抒己见，既有一致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在党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和最终目标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几乎一致的意见；但在讨论党的当前斗争目标和手段、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里作官等问题时，发生了分歧和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大会决定第二天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会议，并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作出裁决。

7月30日，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但会议刚开始，突遭法租界侦探干扰，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立即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由于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法国巡捕离去。

由于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代表们决定改变会议地点。后来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决定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召开，代表们赞同她的意见。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法租界巡捕的干扰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南下。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领，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过于引人注目，行动不便，而未去嘉兴。

陈公博也未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议。他先因法国巡捕搜查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回到他们夫妇下榻的大东旅社41号后，次日黎明，隔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一名叫阿琴的女工在42号房间被一男子枪杀。一夜之间的两起事件，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逗留，31日晚即乘车去杭州，未赴南湖参加会议。

上午10时，代表们陆续到达浙江嘉兴。11时许，他们在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在前几天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

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他却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这绝非偶然。因为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已经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倡导者闻名于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被誉为“思想界之明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他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活动家。特别是他在五四时期的声望和他在筹建党的过程中担任了发起工作，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袖地位，大会代表一致选举他为我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大会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的口号声中闭幕。

4、党的建设的良好开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党的学说解决